第 3卷 第 2期
2001年 12月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ang'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3 No. 2
Dec. 2001

【统战工作研究】

国民党营垒的分裂及其影响

刘兰英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分三个阶段论述国民党营垒分裂的不同特点,并分析其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军事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国民党营垒;分裂;特点;影响

中图分类号:D693.74 文献标识码:A

Splitting of Kuomintang's Camp and Its Influence

LIU Lan-y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splitting of Kuomintang's camp was discussed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 was analyzed.

Key words Kuomintang's camp; splitting;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1931年 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最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以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在民族危亡深重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裂。国民党营垒的分裂,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军事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国民党营垒分裂的历史情况及影响作一比较系统的论述。

一、国民党营垒分裂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

国民党营垒的分裂,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6年 12月西安事变,五年多时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从 1931年 9月至 1932年 5月。这一阶段,国民党营垒分裂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国民党军队一部分爱国官兵,在日军侵略面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对日寇的侵略进行了武装抵抗。主要有东北军马占山部的江桥抗战和第 19路军的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指示东北军抱绝对不抵抗主义,张学良执行这一命令的结果,使占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自溃,丧失了东北三省大片领土。但在东北军中,以马占山为代表的部分爱国官兵,拒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武装抵抗。使日寇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遭到第一次沉重打击,表现了国民党营垒的开始分裂。

1932年 1月 28日,日寇又在上海蓄意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驻守上海的中国驻军第 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在上海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奋起抵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营垒分裂的第二阶段,大体从 1933年 1月到 1934年 1月。这一阶段,国民党营垒分裂的特点表现为一些爱国将领,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支持后,另起炉灶举起抗日反蒋旗帜,直接武装抗日。主要事件有 1933年 5月在北方冯玉祥成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同年 11月在南方发生的福建事变。

第二阶段国民党营垒的破裂发生在第一次华北

收稿日期:2001-10-16

作者简介:刘兰英(1965-),女,陕西大荔人,长安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危机的背景下。长城抗战的失利和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而且在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将领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不再抱有多大希望了。正如蔡廷锴将军所讲的"南京政府既不能领导抗日""要抗日就非先打倒蒋的卖国政府不可"。于是,他们从国民党营垒分裂出来,另起炉灶举旗反蒋抗日。最早另立山头的是爱国将领冯玉祥。

日本侵占热河后,进一步窥视华北和察绥,眼看察冀垂危,冯玉祥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他的声望,举旗武装抗日。1932年10月,他移居张家口,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遂联络方振武、吉鸿昌、商树勋等爱国将领,集合各方抗日力量,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实行武装抗日。冯玉祥的义举,反映了人民抗日的意愿,因此在短时间内,同盟军就发展到10万余人,更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和民众的声援和支持。

1933年6月20日,同盟军在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和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指挥下出师抗日,连克康保、宝昌和沽源,经过五昼夜血战,于7月12日收复多伦,将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首战告捷后,冯玉祥即着手第二步军事计划,准备收复东北四省,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并通电呼吁全国支持共图进行。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及其活动,体现了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与民众抗日武装的联合,它是国民党营垒分裂的典型事件。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绞杀之后不久,1933年冬,在南方又发生了福建事变。这次事变是以第19路军为骨干,并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和第三党势力而发动的抗日反蒋爱国运动。

蒋介石出卖淞沪抗战后,将第19路军调到福建"剿共",结果损失惨重。铁的事实使蔡廷锴等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恰好中了蒋介石一石二鸟的阴谋。1933年10月26日,第19路军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1条,双方决定停止军事行动,进行抗日反蒋军事行动的准备,第19路军开始积极筹划成立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11月初,国民党内及第三党的大批反蒋爱国人士入闽,20日,由全国25个省市和华侨代表及群众、军队二三万人,在福州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脱离国民党,改元更旗,推举李济深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兼军委主席,22日,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李济深等宣誓就职。

福建事变,标志着国民党中一部分抗日民主派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与第三党及其他爱国民主势力相结合,公开另立山头,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变革,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日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的一次尝试。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对全国各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营垒的分裂。

国民党营垒分裂的第三阶段,发生在1936年。这个阶段,其特点鲜明地表现为国民党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以兵谏的方式迫蒋和逼蒋抗日,且收到了特殊的效果。典型事件有1936年6月在南方发生的两广事变和同年12月在西北发生的西安事变。

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均发生在第二次华北危机的历史背景下,民族危机的深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新高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国民党营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就发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1936年5月12日,粤籍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病逝,两广失去了政治领袖,蒋介石趁此图谋撤消两广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简称一会一部),以结束两广的割据独立。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眼看受到威胁,认为"与其等待中央布置妥当,各个击破,不如先发制人"。他们联合于1936年6月1日发动兵谏,举起抗日旗帜,是为两广事变。两广事变是粤、桂两系在蒋介石逼迫下为图存而发动的反蒋事变,但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打出抗日旗帜作号召,使事变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性,成了爱国抗日的运动[1],因而迅速得到了各方和各界的声援和支持。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就爆发了西安事变。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迅即调兵遣将,部署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于是蒋的中央军30余万人纷纷向西北云集,蒋介石也于1936年10月22日来到西安,督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多次向蒋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均被蒋拒绝。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决定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在这关键时刻,张、杨联合发动了兵谏,东北军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西北军在西安城内拘捕了蒋介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石的军政大员蒋鼎文等 10余人,解除了蒋系军、警、宪的武装,控制了西安全城。当日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的八项主张,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2]。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电邀派周恩来等去西安。1936年 12月 17日,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经过紧张细致的工作,迫使南京方面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条件后,释放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是国民党营垒的一次大规模的分裂,它是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的继续。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当时就指出:"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是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3]。

二、国民党营垒分裂的影响

国民党营垒的分裂,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军事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体可分五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营垒的分裂,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的气焰。马占山率部江桥抗战中,几乎全歼日军滨本第 16步兵团,重创了高波骑兵第 2旅,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遭到的第一次惨重打击。19路军淞沪抗战时,苦战一月,歼敌万余人,打得日寇不断增兵,三易其帅,粉碎日寇 48小时消灭第 19路军的疯狂叫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战斗中歼灭日伪军 1000余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寇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奋起抗战,证明了日本侵略军是可以战胜的。

第二,国民党营垒的分裂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力量,缩小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客观条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阵营,附合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主张。而且当时一些有军事实力的集团如粤系李济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冯系(冯玉祥)、闫系(闫锡山)等,均参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共"清党",与人民为敌。那时,革命阵营只剩下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苦斗了,革命政党只剩下共产党了。"九一八"事变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面临亡国灭族,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一致对外。国民党营垒也开始发生分裂,出现了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等抗日派别,发生了地方实力派联合发动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这就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势力。"这种变化是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蒋介石反革命的事情",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客观依据。1935年冬,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对这种变化迅速作出了正确反映,在瓦窑堡会议上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特别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和国民党营垒的分裂情况,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和必要。他指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第三,国民党营垒的分裂,打乱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事计划和部署,间接和直接地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接二连三地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把一些杂牌部队推上内战前线,图谋以达两败俱伤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营垒一些地方实力派联共抗日,必然影响到国民党"剿共"的军事计划和部署。

1933年 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第 19路军被蒋部署在福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但"围剿"不到二个月,第 19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联共反蒋抗日,一下子使蒋介石第 5次围剿的东方战线塌了台。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了 9个师,加上从宁沪杭抽调的 2个师,由浙江和江西进入福建,进攻第 19路军,这就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滞延了第 5次"围剿"的时间。福建事变发生后,第 19路军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退出"剿共"战争,这就间接削弱了蒋介石的军事力量。

1935年 9~ 10月,红 25军和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蒋介石将围剿的重心转移到西北,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向陕北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此关键时刻,在南方爆发了两广事变,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计划。蒋介石花了四个月时间解决两广事变后,迫不及待的回过头来解决西北问题,他亲飞西安,督促张、杨"剿共",不料又发生了西安事变,使六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计划全部落了空。

直接削弱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事件有宁都起义。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四,国民党营垒的分裂,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并为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后,把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放在统一战线的优先地位,拟以西北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1936年初,经过与东北军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经过与西北军的西安会谈,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分别与张、杨达成了协议,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建立。

张学良在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中,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主张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周恩来表示愿把这一意见带回去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不久,在工农红军东征回师通电中,没有再提反蒋问题,显然张学良的意见是一个重要因素。

两广事变期间,中共中央考虑到蒋介石为处理两广事变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日态度的变化,又从两广事变中认识到要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蒋介石身上,于是在1936年8月12日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对手",提出了"请蒋抗日"的口号。紧接着,又于同年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一些抗日言论表示欢迎,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信中还申明中国共产党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正式发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文件。1936年9月1日,两广事变解决接近尾声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上的重大转变,由"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显然,两广事变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共在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同时,对西南实力派的桂系和川系加紧了统战工作。经过多次协商,三方秘密签订了《川、桂、红军事协定》。这个协定,标志着中共与西南的桂系、川系两大地方实力派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北三位一体的大联合,继之又是西南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使蒋介石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他不得不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得以实现。

第五,国民党营垒的分裂,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是日寇的侵略造成的深刻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所引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是国民党营垒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反过来,国民党营垒的分裂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将领武装抗日,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愿。因此,获得各界人士和群众的声援和支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19路军淞沪抗战时,上海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19路军抗战的运动,形成了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敌的壮阔场面。

参考文献:

[1] 刘 斐.两广六一事变[A].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C].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启 事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为季刊,每季末出版。每期定价6.00元,全年共24.00元。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